

佔領日本回憶 (三)

麥克阿瑟原著
鈕先銘摘譯

日皇苦肉計逃刑責

我想日皇也許會對請求不要列入戰犯的起訴，而有所申述其立場。同盟國的一部，尤其是蘇俄和英國，都極力主張日皇應列為戰犯，當時這些國家所提出的戰犯名單，日皇都是列為第一名。我呢！認為這種不公平的處理，不知將招致如何的悲劇的結果？所以對於這種動向，我強烈的抵抗住。

華府也傾向英倫的見解。我當時曾經警告過他們：若必如此，至少尚須準備百萬援軍，日皇若以戰犯起訴，甚至於處以絞刑，那末在日本國中，終不得不設立軍政府，以從事對游擊戰之開端。結果，日皇的名字終得從戰犯名單中除去，可是我並沒有將這經緯，通知日皇。

但是，却出於我的意料之外。從日皇口中所申述出來的，反是如此的辭句：

「我對於國民所遂行戰爭的行動，無論是軍政兩方的決定，我都應負全責。爲了接受閣下所代表的國家的裁判，我特來拜訪以自行投案。」

我聽了大爲感動！與生命共相的責任，據我

所知的各項事實，應不歸罪於日皇。他這種勇於自責的態度，實使我感動腑衷。在那個瞬間，而對面的日皇，以個人的人格而論，也是日本最上流的紳士。

日皇去後，我正想將這種豐采，告訴我的太太；她含笑的阻止我開口，她搶着說：「我已經看到了，我和阿瑟（註：他們的兒子）在紅色的帷幕後都看清楚了。」

真是一次奇妙的景色，可也是一次會心微笑的場面。

與日皇這次晤面之後，我時常受着他的訪問，對於世界的所有問題，幾乎都商討過，我總是有關佔領政策背景的種種理由，很注意的向他說明，而日皇對我所說的話，幾乎比任何日本人都能深切的了解民主真諦。日皇在恢復日本精神的過程中，真正是扮演了一次重要的角色；佔領政策的成功，日皇之誠實與協助，曾有極大的貢獻。

蔣介石元帥的嘉許

佔領初期，在日本原子分裂器破壞事件之前

，華府軍方的上級機構，實施了一次很大的人事異動。陸軍參謀長由馬歇爾換了艾森豪將軍；海軍作戰部長由金氏交給了尼米茲；史汀生陸軍部長去職後，由柏德森副部長遞補。新任部長柏德森在戰爭中，曾和我保持着極密切的連絡；在幾內亞作戰時，也來過我的司令部。

他時常有函件來嘉許我，和砥礪我。他到任不久，曾向我的副官羅拔斯上校表示過如此的意見，當時羅上校正在華府渡假。

「我們對於日本，絲毫沒有任何的顧慮；最大的理由，是因為有麥帥在現地工作。我們所最頭痛的倒是德國，因爲在那裏任何事不得不徵求有關的四個國家同意。關於日本的那種工作，無論是現在抑或是將來，都非麥帥莫屬。麥帥是戰將，也同時是政治家和外交官，其功助將永垂不朽；我是他的百分之百的擁護者，他的成功將毫無疑問。他深切的了解東方和東方人，他的工作，決無任何人可以代替。」

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本土的復員工作完成之後，我頒佈了衆所週知的「公民權指令」。由此廢止了有關限制政治性、民事性、宗教自由

等過去的日本法令。同時停止新聞檢查、釋放政治犯、解散素負惡名的憲兵隊。

我這種行動，在歐洲同盟國家的新聞界中，却掀起了非難的聲討。帶頭作用的，當然是要求參加管理日本佔領而未遂意的蘇俄。在美國的慣例，事無巨細，都不得不請示國務院的決定，我在現地的獨斷專行，當然就成為被批評的對象，當時國務院的遠東工作，是由新任國務次卿文奇遜所擔任。

但是美國一般的新聞輿論，對我的行動反而十分的讚賞，我接到許多從美國寄來的支持我的函件：若例舉一兩件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范登堡參議員的文件：「閣下日理萬機，或無暇以讀大眾來信，然以鄙人在內，千萬萬美國人，對閣下之偉大工作，無不澈底支持者，是敢奉告。」

此外，中華民國的蔣介石元帥，亦有嘉勉我的函件：「對於閣下之佔領日本，與佔領行政之作爲，無任欣佩。」

雖然如此，但我仍感疑惑與不安，一夜之間頓時成爲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若不是一個渾球兒，誰也不得不誠惶誠恐。

太平洋戰略受讚賞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收到從土耳其寄來的一封信件，使我回憶到在陸軍參謀長任內的種種事情。

「昨日在安卡拉所舉行的土耳其語言協會的第五屆會議席上，鈕雷登·艾爾德姆先生提議：選舉麥克阿瑟將軍爲名譽會員。將軍是接受這種

榮譽的第一個外國人。艾爾德姆先生那種動議的原因是：因爲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伊斯坦堡所舉行的第一屆會議時，麥克阿瑟將軍曾爲已故總統阿泰斯爾先生的上賓。」

這種土耳其的隆情高誼，在不久之後，竟在血染的韓國戰場上重新表現出來，這是我當時所未夢想到的。

十一月初，英國軍部的首腦——帝國參謀總長，阿蘭·布魯克元帥來訪問我，充當了我的一個星期的上賓。布魯克元帥是在大戰中我所最欽佩的戰略家。

元帥有實戰高級指揮官的經驗，是一流的職業軍人。他是一位快人快語的人物，不顧週圍的困擾，以超然的性格，擺脫陸海空競爭的束縛，持有世界戰略遠大的眼光。他陸續的在寫他的日記，爾後也曾付梓問世。（註：該日記於一九五七年出版。）在他的日記中，對美國的高級將領，均有嚴格的批評，但對我却有過獎褒飾的記載：——

「我對於麥克阿瑟在太平洋上的戰略，曾加以深切注意，愈看愈使我五體投地。從點與點的超越前進，將大量的日軍置於腦後，使均成爲不起作用的廢物，這是大大值得稱讚的作爲。若是一位普通的指揮官，必會貪食那些毫無價值的小集團日軍，以致發生消化不良，而爲其所牽制。」

「麥克阿瑟是一位給人們印象非常深刻的人物；雖時常含有一點戲劇性的言動氣味，但迄無予人不愉快之印象。無寧說他有一種風度翩翩的態度，而且是十分高尚的氣質。我認為他是一位

極其偉大的人物；在整個的大戰中，他是給了我至上無比的印象，使我帶着這種印象而離開東京。麥帥比馬歇爾尚高一着；假設在這四年間，他與馬歇爾能易地而處，那末在英美合作的幕僚長會議上，我的工作必能更爲愉快。

「毫無疑議的，麥克阿瑟比馬歇爾、艾森豪以及蒙哥馬利更爲出類拔萃。蒙哥馬利固然也是戰場上的鬪士，是統帥人物中的佼佼者，可是若與麥克阿瑟的工作相交替，是否能發揮如此的戰略天才，恐尙屬疑問。」

以英國軍事問題分析家著稱的B·H·李戴哈特先生也和布魯克元帥有着同樣的意見。當然，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毫無必要來接受任何人的見解。我自己對那種高價的評定，也感覺得不自在。但是對於軍事毫無經驗，只作紙上談兵的戰略家們，坐在安樂的搖椅上，以批評當代將領的得失，那些著作，實有嚴加檢討的必要。

附記：阿蘭·布魯克元帥爲第二次大戰中，英國邱吉爾首相所最信任的將領；曾任敦克爾克退却作戰的總指揮官，爾後又承不列顛帝國參謀總長，以天才戰略家名於一時，歿於一九六三年。

華府混亂英俄謀略

在靠近一九四五年的冬季，從對日的管理權內，要求分割單獨管理，這種來自蘇俄與英國的壓力，日益加強。英蘇兩國強烈主張要求與對德一樣，在日本也分區統治。

我始終拒絕這種政策，可是，到了十月末，也不問問佔領軍四分之三是美軍的這種樣的事實，就通知我說同盟國正在計劃成立一個對日委員會。

對這一點三國會議我是十分的反對。在太平洋戰爭中，美軍所付的代價最大，因此美國有單獨處理以完成和平恢復的權利，這是我的見解。可是，在十二月中，為此問題，要在莫斯科開一次三國會議；並將派國務卿詹姆士·貝爾納斯前往出席。也不知為何緣故？會議中竟沒有中國和法國。

我未曾自會場中獲得任何聯絡與情報。以日本為主題之會議，除新聞報導之外，我却一無所知。聽說是要美國將單獨管理權讓出來；變換一個方式，通過遠東委員會的政策機構，以實行國際管理。這個機構將設立於華府；同時，由盟國對日理事會的中美英蘇四國，另行成立一個諮詢機構於東京。這種計劃，在莫斯科的公報中與杜魯門總統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裏所敘述的也並不一致。

「我們雖然也期待蘇俄參加對日作戰，可是以波茨坦會議的過程中，我堅決的不希望蘇俄參加對日的管理。」

由於華府對政策調節欠佳的結果，乃招致極端的混亂，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於是在美國國內，對莫斯科的決定，就掀起了猛烈的攻擊。在極大的非難聲中，政府却將責任轉嫁於我。十二月三十日，國務院的一位官員——杜默斯·布雷克代表遠東委員會以答復這種非難說：「麥克阿瑟將軍對於管理日本的新計劃，在莫斯科會議承認之前，業已有所準備，並無特別反對之意。在會議中，凡關於日本與遠東的問題，均曾通報麥帥。」這種聲明，可以說是極盡其逃避責任的能事，所以我也不得不立刻有所辯解：

「遠東委員會一位長官的聲明中：對於管理日本的新計劃，在莫斯科會議之前，說我『並未加以反對』一語，是不正確的。這在莫斯科會議之前，十月卅日我曾有一電報給國務卿的最高助理官，聲明對於那種協定的條款，在我的見解內是決不能予以承諾。所謂對日管理的新計劃，我始終反對。此後，從未徵詢過我的意見，布雷克先生所謂莫斯科會議中，關於日本問題均曾通報我這一點，也與事實不符。所以我對於莫斯科會議的決定，將不負任何的責任。」

我這個聲明，雖經國務院予以證實與承認；但是，內外裂痕從此日益擴大，却是我所十分警惕的。

遠東委員會的鬭爭

遠東委員會是國際性的組織，而且包含蘇俄在內，其組成的四個國家，都握有否決權。這種影響，使得議案的審議極難進展。其活動的範圍，僅限於對佔領軍權限內已行之工作，加以確認而已。

蘇俄的代表從開始就想利用這個委員會，作為宣傳機構；用破壞性的演說與聲明來阻撓日本的政治秩序。美國國務院對這些宣傳向來抱着不干涉主義，所以更使駐美的蘇俄大使，正好利用這種沉默，大膽的鼓動着他那前所未聞的毒舌，對佔領政策無所不用其極的吹毛求疵，以期打倒聯軍最高統帥和日本政府。

我覺得對蘇俄只有以牙還牙才行，所以我發表了如次的公開答覆：

「聽到蘇俄大使在遠東委員會席上，對美國在日本的政策，作漫罵性的演說後，我覺得其毫無真實性和現實性。僅不過反覆的發揮着他那種蘇俄式的毫無責任感的離譜宣傳，除此以外，全無內容。其所以要發表這種漫罵性演說的基本理由，是因為他們的工作完全失敗，他們企圖吸收日本進入共產主義思想的勢力圈內，已不可能。

蘇俄的這種工作，從佔領當初開始，即未中斷；他們想在戰爭災害和國民生計陷於絕境的日本國家中，其可能的撒播著不和與摩擦的種子。使日本民眾受到澈底的災禍，由此而產生絕望與悲呼，以育成其無神論與全體主義的邪魔的奴隸觀念，這完全是蘇俄所期待的。

可是由於日本國民的先天的良知和保守主義，在佔領下所耕種的民主自由觀念，再加上極其顯著的業已改進的生活條件，使得蘇俄的努力毫無作用；因此蘇俄就惱羞成怒的作出那種撒野和卑鄙的言行。這也就證實了他們的宣傳，全歸失敗。關於勞動自由，自由經濟以及暴虐行為，蘇俄的那種叫囂的姿態；使得聖經新約裏的最善扯謊者阿那捏斯為之遜色；至少在阿那捏斯的罪行中，並未包含着挑撥性的偽善成份。」

我所用的言語，雖極粗魯，但非此不足以對付蘇俄。遠東委員會始終沒有跳出一「讓而不決」

的範圍；一直到對日和平條約簽訂後，才壽終正寢。遠東委員會乃至他的衛星機構對日理事會，自始至終就沒有發表過一次是有關指導日本的建設性的意見。

對日理事會，在組織規程上早就註明了是諮詢和商討的機構。但是在實際上却非牛非馬。這個機構唯一的特色，是對任何的工作，都極盡其阻撓的能事，也是一個可以公開罵人的舞臺。

指示幣原首相七點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受降之日起，一直到是年十月間，日本的首相是由日皇的叔父東久邇宮所擔任，日皇生怕因為親族的關係而妨害了佔領軍所實施的種種改革政策；所以就更換了幣原男爵來代替；幣原喜重郎是日本最受尊敬而有豐富經驗外交官之一。

新任首相來造訪的時候，我對他指示了如次的意見：

「關於日本社會制度之改革，對於下列事項應盡量提早施行。

一、實施婦女參政權，以期解放日本婦女；其目的在使婦女參加政治體系，給日本一種新觀念——政治直接影響到家庭的福利。

二、勞動者之工會，應獎勵其組織化；其目的在維護勞工不受搾取與奴工；為提高生產水準，應給與工會更多之發言權。

三、應掃除僱用童工之惡習，並講求必要之措置。

四、開放學校為自由教育；其目的在使國民

基於實際之知識，以計劃將來之發展。同時使其理解政府並非國民之主人，乃係國民之公僕，基於這種制度以產生國家利益。

五、秘密拘捕與刑求，足使國民墜於恐怖狀態，諸如此類制度，應速予廢止。同時應樹立公正之審判制度，使國民不致遭受專制、強制以及不正當手段之災害。更應維護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凡假借「效率」名義以統治大眾者，為任何政府所不許，應速予廢止。

六、經濟機構應實施民主化；其目的在使生產、通商不為私人所壟斷，保證其受益廣泛分配於國民。禁止產業獨占支配。

七、當前之行政措施，為防止時疫、疾病、饑饉等有害社會秩序之事端發生，政府應速講求有關國民住宅、食糧、紡織工業等事項」。

幣原首相對於我的指示，誠心誠意的表示贊同；而且他馬上極有效率的開始工作。關於日本的改革方案，僅依一紙命令，或憑佔領軍之武力恐怖，我覺得並不足以付諸實現；完全由於形式化所產生的改革，將不為日本人全面所歡迎。在武裝壓力之下，尚且不易持續；一旦壓力消除，則一切必招致停頓。

改革日本的各階層機構，變更日本政策中之神話性的現實主義，以及掀起日本在精神方面的思想革命，均為達成佔領目的所不可缺少之因素。但如不能符合日本國民之意旨，即使付諸實現，亦不能持久，這是我所十分瞭解的。我深覺此點乃是我的使命成功與否的最大關鍵。這種自覺，一直支配我在日本統治中的一切

思考與行動。我對部屬會如此的告誡過：

「我們不能為了要求盡善盡美，而來干涉地方的行動，所謂盡善盡美即使我們美國也許不那麼容易辦到。日本人現行的法律，是基於日本人的思想以及其主動力所製作。因此雖覺不夠完美；但是這種法律，在爾後或許可以均衡或承受日本國家權力所產生之壓力。」

審判戰犯罪魁結局

在波茨坦宣言中，有一條特別指令：「凡戰爭罪犯，包括對同盟國人員或戰俘有虐待行為者，均應嚴加處罰。」根據這條指令，日將山下奉文（註：為日軍大將，一九四一年冬任襲擊新加坡之最高指揮官；爾後一九四四年十月任日軍第十四方面軍司令官。性極殘暴，有馬來之虎之稱。）即交付馬尼刺軍事委員會審判，經判決死罪而執行。山下曾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申請上訴，但遭駁回。當時在最高法院的九位推事中，僅麻費和萊雷奇兩位推事贊成發回更審。

杜魯門總統也支持這個判決；一九四六年二月曾送到我的總司令部來會商，我在審判書中申述了如次的意見：

「在大規模之軍事行動中，對戰敗之敵，判處罪刑，本應慎重考慮。但對戰犯山下奉文之審判過程中，余欲搜集有利於被告之事實，竟一無所得。山下之殘酷，目無法紀，誠罕世所稀有。本判決所載明之犯罪事實，不僅有傷軍人職業之尊嚴，且為人類文明之污點，其恥辱與不名譽之紀錄，將永誌不忘。」

余對委員會之審判與判決，認為可行。當即令西太平洋陸軍司令官，擬奪該被告之軍服、勳章及一切代表軍人之徽誌，並執行死刑。」

本間雅晴（註：中將為日軍菲律賓派遣軍最高指揮官。「死亡行軍」的責任者。所謂「死亡行軍」者，即一九四二年巴丹，柯里幾得爾被攻陷後，本間命美菲兩軍之戰俘，作長距離之徒步行軍；在炎熱、時疫及糧食不足下，死傷達二萬五千人之衆）也是由馬尼刺軍事委員會審判，一直隱瞞着的「巴丹死亡行軍」事件，一旦公之於日本民衆後，很掀起了一陣衝動。日皇根據這類報告，下令開除了本間的軍籍，沒收了他的勳章。軍事委員會經審判後，宣判處以死刑。

這個判決是一九四六年三月初決定的，最後送呈我來判行的時候，本間的妻子爲了申請從輕發落，要求直接來晉見我，我也就答應了和本間夫人的晤談。

本間夫人是由爲本間辯護的美方軍官偕同來見我的；與這樣一位教養高尚，具有魅力的貴婦女會談，是我平生最爲爲難的事件之一。

我對本間夫人解釋說：所謂戰爭者是多麼的充滿着罪惡！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家庭主婦，也殃及池魚的受到這種悲慘的結果。我對於本間夫人的請求，必加以慎重的考慮。

雖然經過慎重的研究，可是我終於三月三十一日，還是批下了如次的最後的判決。

「在任何國家，凡對『是非不明』、『道義不分』的指揮者，而託以軍人之榮譽，決非適當。本案之證據確係爲實明，且充分說明被告對人

類之絕對性最低標準，亦未加以重視。在本案審判過程中，余不僅對本法庭之審判權，即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持之少數相反意見，均曾加以慎重之思考。然余終認定被告爲有罪之判決；故令西太平洋陸軍司令官執行之。」

由於在菲律賓美軍復員終了的關係，所以其後有關於美國的此種案件均歸東京之國際法庭處理。其他同盟國家的戰犯，則由其本國的國內軍事法庭審判。

東條英機行刑經過

在佔領期間，我所體會到最擔心的事件，厥爲對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判決之執行任務。

我雖然十分贊同：在戰爭中有對俘虜或拘留者而加以殘暴行爲者，抑或核准此種行爲之敵方現地司令官，以及其他與軍方有關係者，均應加以處罰。但是對於戰敗國政治指導者，若追究犯罪責任，我感覺得極不適當；因爲這是有違審判的基本原則。

我認為如果必定要追究日本政治的指導者當時的戰爭犯罪責任，最多也只能僅限於對珍珠港攻擊者之告發；我曾經這樣的建議過。因爲珍珠港之襲擊，是違反國際慣例與國際法，未經宣戰就開始了攻擊。

從那以後，我被解除了有關國際軍事審判之一切責任。這個審判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開始在東京進行。

日本有兩所最大而且現代化的監獄——巢鴨和橫濱。在那裏收容了從東條前首相一直到東京

玫瑰（註二），數百人階層不同的戰犯。東京玫瑰僅不過是一位女播音員而已，也和其他多數的殘暴者一樣，以B C級的戰犯身分，同關在一起。

在甲（A）級戰犯中，一共關了二十八名；那都是有關指導開戰的最高責任者。於審判進行間，有二名中途死亡，一名患精神分裂（註二）。不久，那些審判的判決，都送來我審查。爲了確定這種審查，我曾經徵詢過各同盟國在東京的首席代表的意見；而我自己也詳細檢討過那些審判紀錄。我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曾發表審查報告，其中有這樣一段敘述：

「余經歷軍公務人員之生活甚久；其中有不少之任務，雖歷盡艱辛，但對遠東國際軍事審判中日本戰犯判決之審判工作，最感不快。

「對此問題，余僅就當前之任務及所被限制之權限範圍內，作如下之申述。詳細參照同盟國所示之各種原則與手續，對審判本身之進行，以及所下之判決，尚未發現有任何疏忽不當之處。多數人對判決之意見，各有不同，自所難免。博學多才之審判官諸公，其意見亦不獲一致。雖然如此，但在此社會文明尚不够完善之過程中，對軍事審判之精誠工作，亦不得不加以信賴。故余即令第八軍司令官予以執行各刑。」

不問我是否發表審查報告書，其中有七名判處死刑的戰犯，新聞界要求在執行死刑的現場攝影。這種要求的壓力極爲強大；但我認爲這種新聞照片，有害日本人以及世界良知人類的感情，所以加以拒絕。可是這種壓力就轉變了方向，指

向着陸軍部長。我還是未予同意，因為我認為與其說我是美國軍人的身分，無寧說我具有國際性行動的資格。所以這種要求，結果仍被駁回。

但是，為了防止虛偽行刑的謠言，我曾邀請對日理事會的四國代表，參與行刑執行的現場，以昭信實。各國的代表，雖然未盡樂於接受，但終竟承諾了我的邀請。

在這種艱辛的時期，日本國民的態度，却表現得十分良好。在審判中，多數的被告都有函件給我或者給法庭，申述對審判公正的謝意，不論是判處死刑或監禁，也有許多被告的家屬，呈送着同樣的信件。因此，軍事審判所給與日本國民的惡感，幸止於最小的限度；終令工作完成。

(註一) 東京玫瑰，原姓戶栗，為洛杉磯之

土生日僑。在太平洋戰爭中替日軍作心戰之廣播。
(註二) 前滿鐵總裁及第二屆近衛內閣之外相松岡洋右，與前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元帥，以上兩名戰犯均於審判中途死亡。其次右翼團體「袖武會」領袖，法學博士大川周明則於審判公開庭中，突患精神病，拳擊東條首相之頭。

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

祝秀俠教授著
上下冊合售新臺幣一四〇元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高劍父、屈大均、羅文幹、吳鐵城、陳公博、曾養甫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冊七〇元下冊七〇元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